

論范仲淹之書法與文學

湯承業

仲淹（以下以其謚號文正稱之）的人生，乃是藝術與道德結合的全人生；其性命，亦爲道德與藝術結合的全性命。明乎此，始可知其書法之所以勁而美，與文學之所以美而勁。固可藉書法以透視先天性格，又可藉以反映後天修養；蓋書法之外在，固爲人之才藝，而其內在，却爲人之品性。文正之書法，所以如「龍跳虎臥」而「遒勁嚴整」者，就在其落筆「痛快沉著」；而其所以如「龜文龍鱗」而「氣嚴法備」者，就在其運墨「動合法度」。凡此，似乎皆爲其表象，其實却爲其內涵；其所以被贊爲「柳骨顏筋」而「渾厚端莊」者，不獨因筋骨爲內在之「清勁」，卽莊厚亦爲內在之「華美」。所以，不知文正胸中之節義，則難知其筆鋒之剛勁；蓋寫字固須「鉤指回腕」，尤須「注神貫氣」也。文正之文學，固然文法互通，文體參用；且因其句式多，層次明，而有其「怒流出峽」之氣勢美，與「典雅純實」之康壯勁；且以爲憑其「卷舒變化」之「高妙文詞」，就可一掃「文章柔靡，風俗巧僞」之積弊。其實此又爲其表象，並非其實質。案文正之文章所以常化景爲情與寓情於景，乃其期藉文學造詣以「漸隆古道」與「興復古道」；易言之，則經由「文以載道」（學術）而達成「輔成王道」（政治）之意志。可知其爲發於至誠與積於至憂者，亦卽其作品爲憂與誠所交織之結晶。雖然在其作品之振作中而顯其文采，在緊縮中而見其剛勁；但在文采與剛勁之後面，隱藏着其養氣勵志之工。蓋文正主張以道爲本，以文爲末，故其寫作皆爲「貫通經術，明體達用」者，質言之，文正乃斥空言，重實效之高士，故必化其意志爲作品之力量，以「鼓天下之動」，以「垂天下之志」。所以，必先透其作品而識其心，然後而可信其誠也。

壹、書法勁而美

（甲）風節忠義

史載歐陽修幼孤家貧，「至以荻畫地學書」（宋史卷三一九，本傳）。文正幼年之孤苦，較之歐陽尤多過之，其發奮於長白山時，乃求「積學於書，得道於心」（范集卷四與周推官書）；似乎並無「以荻畫地」之閑情與雅意。登科入仕之後，又值軍政倥偬，其爲「謹疆場之細事；佇干羽之大猷」，乃「竭力悉心，夙宵乃職」（范集卷四，謝許守舊官表）；當然更難抽暇以拈毫運墨。若云筆墨之運潤，可助於修心養性，然文正爲「天地間第一流人物」（褒賢集卷五朱子語），固不必藉筆墨而爲修養之用；反而可因其修養境界之日高，自可增其筆墨之神韻；所以，由筆墨之間可以窺見文正之修養，而筆墨並非盡能代表文正之工力。案文正平生雖常寄人以詩文（范集卷六、七）。或爲賢者撰寫碑銘（范集卷十一、十二），但却絕少題字贈人者（註二）；蓋詩文寓勉人之意，碑銘寓褒賢之意，而題字贈人者，若被棲而懸之，則多少寓有炫耀筆墨之意，文正之心，其「正大光明」者，正如「青天白日」（朱文公文集卷三八，與周益公書）；豈屑爲之！所以其因欽服唐代名相狄仁傑與李德裕，而爲之作記立碑與建祠刻傳等；但雖曾運思而作，却未必運筆而寫（范公年譜，五十歲，寶元元年）。案文正以爲「以道自樂，榮利無窮」，故常勉友人「亦且讀書，涉道貴深」（范集卷，十尺牘）。以此言之，欲求文正之筆墨真跡，誠屬不易。

文正乃「平日胸襟豁達」之人（朱子語類卷一二九），其所以多爲人撰文而少爲人題字者，則並非其吝嗇，而正是其修養。直至晚年（六十三歲）出鎮青州時（即逝世之前一年），方「得以暇日，游心於藝事」，乃因蘇才翁（即蘇舜元）之求，而用黃素以小楷正書韓愈所作之伯夷頌相贈。

文正公以寶元元年（公元一〇三八）赴潤（今江蘇鎮江縣），道謁狄梁公廟，爲之作記立碑，又十三年，皇祐三年（公元一〇五一）鎮青社（註二），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；蓋去公薨半歲耳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柳貫語）。

文正所以以年衰多病之身而楷書伯夷頌者，一則因其對伯夷之景仰，故曰：「古人尚友，以其類也」；案「伯夷之心，惟孔子爲能知之（註三），千載而下，惟文正范公有以似之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曹鑑語）。一則爲振士氣，倡名節，以力矯五代廉耻道喪之遺毒（見宋史卷二六二，史臣語）。如曰：

其（文正）平生特立獨行之志，夷險一節，老且至死不變，而見於心畫者如此，與守桐廬日祠嚴子陵祠同意；清風凜乎其相應也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郭陞語）。

案：以「伯夷之清風，昌黎之偉詞，文正之墨寶」，三者薈而爲一，真可稱爲「世間罕見」的「三絕」（同上）。

伯夷之行，昌黎頌之，文正書之；真三絕也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董章語）。

首陽特立古今無（註四），韓頌還兼范老書；三絕世間真罕見，商彝周鼎可能如（同上，富弼撰）。

固然「伯夷以特立獨行之節，不待退之頌之而始顯，惟得退之頌之，則其節爲益顯，吏部以日光玉潔之文，不待文正書之而可傳，惟得文正書之，則其文爲益傳；」「退之第一唐文人，希文第一宋輔臣」；自然易爲「天下後世之仰服」，則「其有功於世教大矣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韓璵語）。故曰：「范墨韓文傳不朽，首陽風節轉孤高」（同上，文彥博撰）。

正因范墨韓文「字書皆秀」，而「令人肅然起高山之仰」；所以極易因傳頌而廣播（范集補編卷三）。如詩曰：

孤竹身爲百世師，范公手染退之辭；不知青社揮毫日，得以天章論道時（同上，文傳載撰）。

鐵畫銀鈎黃素帖，珠還璧返歲寒堂；須知此事關風教，子子孫孫盍寶藏（同上）。

青青首陽薇，皎皎孤竹子，求仁亦何怨，清風千萬祀，昌黎述玄聖，雄文劇頌美，偉哉青社書，感激有深旨（同上，江澤民撰）。

如此詩句，則展玩之頃，「頓覺忠義之氣，凜然在天地間」；誠由於文正與昌黎之「清風勁節，德行文章」，對人有所感動以致之也（同上，王離語）。況文正爲「事業滿邊陲，忠義滿朝廷，聲名滿天下」的一代「名臣」（同上，韓璵語），則更易使人發生「尊賢尚義」之向心力；如張伯淳曰：「幸獲睹范公之所書，義士仁人，壯顏毅色，凜在心目間。使頑者懦者一見，且流汗破膽，知畏議論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案：文正之筆墨所以能感人如此之深者，以其心伯夷之心也，故曰：「慶曆元臣細字書，清風眞如伯夷俱」（同上，楊彌昌撰）。

〔二〕

明代宏治間徐貫贊文正之「道德功業，烺烺炳炳，當以三代以上人物論之。」所以一其片字隻紙，流落人間者，雖三天之童，皆知寶之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爲珍惜文正所書之伯夷頌，柯讓特撰賦文以誌之：

企清風兮、薇山之陽，寶芳帖兮、薇露之香；意人世不可以久留兮，雷霆下而取將；幸鄰侯之巾襲兮，儼墨蹟之未亡；

把一麾而東來兮，文正之鄉。喬木蒼蒼兮，蘭菲菲其彌芳；嘉先正之有後兮，偉德澤之長。出此帖而歸之兮，甚巍笏之輝煌；時不可兮再得，勉世世兮珍藏。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案：柯讓所云之「鄭侯」，即爲李戡，所謂之「東來」，即指李戡「守吳」而言。緣文正「書此頌遺武功蘇舜元（卽蘇才翁）」，南渡後歸秦檜氏。又歸賈似道氏。宋亡流入北方，李侯戡得之京師，來守吳實魏公之鄉（註五），因謁公遺像，以其書歸其後之人；今藏於范氏義莊，子孫世守之」（補編卷三，柯九思語）。復案此文曾云其秦賈二氏者，乃因「宋南渡後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；至李侯戡得之於燕，則宋亡之明年也」（同上，黃溍語）。

文正晚年寫此伯夷頌時，已是「眼力不逮」矣；想其筆下蒼勁固存，而花眼以書小楷，自必格外吃力；蓋寫此頌時，文正之次子純仁隨侍在旁，所以其「再見手澤，不勝悲慕。」如純仁書曰：

皇祐三年，侍行於清社時，先公書此頌以寄京西轉運使蘇公；今再見手澤，不勝悲慕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及至徽宗崇寧五年（公元一〇二二），文正之四子純粹「得見先兄（純仁）遺墨於潁昌（今河南許昌縣）」，伏讀久之，涕落紙上」（同上）。對此「劍出豐城，珠還合浦」之美事，王離固贊李戡有「仁人之心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；但若「非世有賢子孫，惡能珍藏之若是耶」（同上，載仁語）！蓋以其雖經元兵之禍，而此卷猶得幸存。

……兵至，義莊祠宇俱爲灰燼，此卷同罹此患，覩必不存，大宗孫廷珍、十世孫天倪，復觀之於軍砦中。嗚呼！公之靈在天，天佑其忠，俾公之手澤不泯於世（同上，王離固語）

其後，文正之五世孫尚書清憲公之柔，與其兄良器爲之力復義莊，所以至元代此卷仍存於義莊之中。如：

韓文稱頌伯夷賢，黃素真書慶曆年，月照明珠還合浦春，風長共義莊田（同上，至正甲申六月辛未，篤列圖撰）

案文正之此一墨寶，在歲月中歷經「得之復失，失之復得」之遭遇，確乎「若有以冥護之者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胡文靜語）。蓋「世有兵火，而古物之遭甚刲者，不獨名人遺蹟，而名人遺蹟尤易消毀，其獲存於世者，皆神物也；」所以王心一曰：「六百年來、聚散得失，不知幾經人手，獨見超然刲外，至今日而范氏之物置歸范，家藏無恙」（同上）。康熙間，文正之二十代孫承勳任兩江制使，因往蘇州視范廟，「主奉能濬出文正公諸手澤見示，眞吾宋世寶也；卷帙零落，因請歸署內，命工裝潢

新之，還納祠中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文正之伯夷頌卷中，有歷代賢者爲之題跋，所以「宋元以來，題詠甚多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；且諸公「爭爲詩歌題識，其間極多名筆」（同上，王世貞語）。惟可憾者，「當時秦賈二賊，皆有題識，故論者恨之」（同上，王心一語）。蓋後人借觀者，則「焚香再拜」，而令奸賊廁筆相沾，「是可笑也」（同上，吳寬語）！誠如明代徐貫所云：

若檜與似道，迺宋之賊臣，（文正）公視之直不啻犬彘。其墨蹟豈可廁於其間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！）誠然，「觀者輒有題跋」，以識景仰之私，且欲託名於不朽耳，檜何人，斯亦有詠焉？」所以明代朱彥昌曰：「愚欲其子孫割去之，使無汚此卷可也」（同上）。余則以爲不必割損之，保留之亦另有其義。如明代楊澤所云：

拜觀是卷，以韓（琦）富（弼）諸公之詞翰，以秦（檜）賈（似道）二人之圖書，一善一惡，而勸戒具焉；有志者得不凜然而敬慕、惕然而警懼乎（同上！）

總之，「卷後題跋甚富，多名賢擅臨池者」（同上，朱勳語）。憑此，就可淹沒秦賈二賊之奸蹟，既可淹沒，可免割去；猶如西湖邊上既建岳飛之墓，又鑄秦檜之像，同一意義。蓋謁岳墓者，正如觀范墨者同一心境，乃若明代戴仁所云：「恭覩遺墨，肅然起敬，悚然汗下，凜然如公之在前也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〔三〕

王心一論之曰：「文正德業文章，爲有宋以來第一人，書法其小技也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所以，於論究文正之書法時，特應注重其寓於書法中之德業……案文正「信道之篤，躋而益奮，老而愈厲」（同上，牟繼語）；故昌朝謂其「好談古賢人節義，老而彌篤」（同上）。質言之，文正手中之筆墨，乃代表其胸中之節義。蓋「此書皆謗毀艱難者，讀之益以自信，故退之希文尤懲慄耳」（同上）。是知其心其志，乃欲倡節義而振士氣也。

希文健筆鈔韓文，文爲首陽山下人，寧止一言旌義士，欲教萬古勸忠臣（同上，執中撰）。

而其所以感人特深與與引人共鳴者，固在其表達節義之文筆，尤在其蘊於文筆之節義：

書從北海寄西豪，開卷裁窺竦髮毛，范墨韓文傳不朽，首陽風節轉孤高（同上，文彥博撰）

由於「長白山中名相出，首陽山下若人賢」（註六）；所以張伯淳曰：「偉哉君子無窮澤，留得餘芳奕世傳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|文正之「豐功盛德，煥乎簡策；若日星之不可掩，山嶽之不可齊」；可說「始終大節，一合乎道」；所以泰不華曰：「然公不他書而書韓子伯夷頌者，尤見公切切於綱常世教，未嘗一日而忘也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對於文正藉筆墨以弘節義之心境，元代胡助最能領會之。如：

翰林嘗託文章傳，文章益重節義全；使無節義照千古，文章翰墨空嬋娟。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案此詩之中，極爲強調「節義」一詞，其可謂深得文正之心。而文正此旨，亦爲繼承與弘揚中國道統文化中之傳心之學；柯九思之所論，頗符聖人之旨，如曰：「太史公纂史傳，思可以勵節義維綱常者，許由務光之倫，其事不經，得孤竹之子，遂爲數千載人物稱首，遷之志念深矣。唐韓子探其微旨，著伯夷頌，文正公復得韓子之志，而爲之書；蓋公屢以忠讐不容於時，遭誣擯斥，守道彌篤，所謂不動心以有爲者，其在斯人歟！其在斯人歟！夫聖賢所遭之時雖異，至於勵節義維綱常，而天理民彝賴之不泯者，則一而已」。此卽「觀此書者，莫不興起」之道理所在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|文正之此一筆墨，確乎令人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徐貫語）。以其「名文有託幽光顯，餘事能傳楷法深」；故可發人「西望天平萬笏林，凜然生氣到如今」（同上，吳寬撰）。因伯夷聖之清者也，而頌「之者固尚其節義之清，書之者亦尚其節義之清」（同上，戴仁語）。後人「觀其書而究其心，誦其文而論其世」；是則「千載之下，流風猶襲人襟懷」（同上，王鼎語）。案文正之此心此筆，對於世道人心，確實發生大作用、大影響。如：

故伯夷之節，惟知適於義而已，初不計後之頌與否也；退之之頌，深以爲亂臣賊子不守名節者之戒，初不計後之書與否也；三者無心，會而爲一；虹光渥彩，昭如日星之垂天；使世之亂臣賊子，未爲者而觀此書此頌，則神駭心悸，而不敢肆其惡；已爲者而觀此書此頌，則膽落魄喪，而無所逃其罪；有功於世教大矣（同上，韓璵語！）。

案：伯夷、韓子、文正「三者」雖皆「有功於世教」，惟「三者」之外，尚有李戡、亦與於「有功」也；如牟巘曰：「大興李侯戡，丁丑歲得此本於燕，謁來守姑蘇，偕濟南陳君祥、汴梁焦君德明，首詣（文正）公祠下，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，尊賢尚

義有如此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(乙) 精美剛勁

(一)

書法不獨可代表先天之性格，尤可象徵後天之修養，譬如見過歐陽修所書之「九成宮碑」，肩胛結構，極為謹嚴，則知其必為「天資剛勁，見義勇為」之人；其後之「論事切直」而「巍然有聲」者，由其書法中，已可見其過半矣（宋史卷三一九，歐陽修傳）。再如岳飛所寫之「滿江紅」與「出師表」，神速有力，氣勢萬千，則知其性格為「忠憤激烈，議論不挫於人」者（宋史卷三六五，岳飛傳），雖是軍人而能「綴采敷文，網羅文士」，以至「游士墨客，清流名宿，莫不歸之」（王夫之：宋論卷十）。再觀文天祥所書之「朱子格言」等，厚重泰若，內豐外潤，則知其志節必然是：「有一日之生，盡一日之瘁」（同上卷十五）。案文天祥之書法頗類顏真卿，其忠貞之操守亦類之，同為「時窮節乃見」之民族英豪，故王夫之贊其「竭力殫心，以為其所能而已矣」（同上）。蓋書法者，並非單憑其指技與腕力，而指腕之運轉所表達者乃是心中之志與胸中之氣；若胸中不寧靜，則雖有才華亦不能治國平天下。如牟應龍之評王安石者，正說明此一道理：

世稱王荊公書如斜風急雨，其胸中躁擾可以想見：一旦當國，遂盡取成憲而紛更之，而風俗亦一變而趨於薄矣。厥後溫公復古而國再安，章蔡崇新而世遂亂，其正與邪，皆莫逃於筆墨之間；益信心畫之說不誣。然究其大歸，則熙寧以前之書，多厚重而少輕浮，熙寧以後之書，多輕浮而少重厚，茲蓋世道之所以升降者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可知風俗之厚薄，亦與書之重輕為正相關也。牟氏所謂「其正與邪，皆莫逃於筆墨之間」之語，確乎有其見地；蓋其乃為根據史實而歸納之結論，如曰：「予嘗從故家盡得宋南渡前墨蹟觀之，而竊為之說如此」（同上）。

文正之為人，乃是「內剛外和」與「沉愛樂善」者，雖然「每感激論天下事，奮不顧身」；但其臨政處事，却極為謹慎（宋史卷三一四，范仲淹傳）。可知文正為志大心細，胸擴手緊之人，即平時常寄於友好之書札，都是「蠅頭細書」與「氣嚴法備」。如韓琦曰：

自公之東，信問時止，愛顧益深，交朋莫二，蠅頭細書，以時爲寄；珠貝雜幅，氣嚴法備（范集，褒賢卷一，韓撰祭文）。

案文正雖爲寄於朋友之「蠅頭細書」（函札），亦必爲之「氣嚴法備」，則其修養之醇與對人之誠，可以想知矣。蓋「書雖細事，而最足以觀人」；故牟應龍曰：「公書如是，而心中之所存可知已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由此可知，唐宋兩代所以多產能臣名相者，則由其選舉而重視「身言書判」者，不無關係（見宋史卷一五八，銓法上）（註七）。單就其「書」而言之，不獨可見其人之才藝，尤可得見其人之品性。

文正爲友人寫信，都是「蠅頭細書」，則其所寫之伯夷頌，當然更是「黃素小楷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其所以令人「真可敬而仰哉」者，即是其「楷法謹嚴，一筆不苟」（同上，牟應龍語）。如吳寬有詩贊曰：

西望天平萬笏林，凜然生氣到如今；名文有託幽光顯，餘事能傳楷法深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案·蘇舜元亦爲「善書」者，但其「深服（文正）楷法之妙」（同上，黃溍語）。其所以求文正爲之書者，亦正因「深服（文正）楷法之妙」。如牟應龍曰：

文正公所以師表百世者，固不在書，然筆法之妙，自足追媲古人；故蘇公號稱能書者，亦從公求之，以爲珍玩焉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可知文正所以「筆法之妙」，則在乎其能「追媲古人」，此「古人」者，即指顏真卿與柳公權而言，如王鼎曰：「後世珍襲或咏歎之……豈眞所謂卯骨頽筋，而作祖書法耶」（同上！）對此，戴仁且更加肯定之，詳爲描繪之，如曰：

式觀遺墨，端嚴濟楚，柳骨頽筋，微公孰與！龜文龍鱗，或翔或處；烈士忠臣，兼文兼武。畫見諸形，曰心爲主；詞發諸口，曰學爲府。石抉怒猊，章成繡虎，百世彌藏，弗替厥祖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案·王鼎與戴仁皆以「柳骨頽筋」以贊美文正之書法，可見文正似曾摹其筆法而俱其風格。而文正之字所以被稱爲「渾厚端莊」者（同上，牟應龍語），就是因爲其兼得顏柳二公之長，蓋顏字「渾厚」而柳字「端莊」；其筆力與墨氣亦皆蘊於「渾厚端莊」之中。其更可貴者，則爲顏柳之書法，爲「藏鋒」，爲「廻毫」，力量在內，鋒鏑不露；其工力在此，其修養亦在此；此

亦其最異於趙孟頫與成親王之處。文正之字，就是兼取顏柳之優點而特創之「藏鋒字」與「廻毫字」；如羅志仁贊其「用筆實處，是其最工，想其鉤指回腕，皆入古人法度中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此所謂「鉤指」者即「藏鋒」之藝，而「回腕」者乃「廻毫」之術。

(二)

文正盡瘁於國事；無暇游藝於筆墨之間，所以其並非以善書名世者，但其「筆意精嚴，動合法度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柯九思語）；則世之善書者，亦難與比及。如清代宋犖曰：

文正公爲有宋第一流人，固不以書名，而此書謹嚴有法度，一筆不苟，世之善書者，或莫及焉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案：世人「或莫及焉」之要點所在，即爲其「謹嚴有法度，一筆不苟」；而「謹嚴有法度，一筆不苟」者，亦正是文正書法之特點。此一特點，乃純指其楷書而言，至於篆書者，其藝術成分多；而實用價值少，故文正不曾用工於此；例如其所撰之「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」（范集卷八），即曾專函拜請邵鍊爲之篆書，其函略曰：

暨抵桐廬郡，郡有嚴陵釣臺，思其人，詠其風，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！能使貪夫廉、懦夫立，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。構堂而祠之，又爲之記，聊以辯嚴子之心，決千古之疑。又念非託之以奇人，則不足傳之後世，今先生篆高四海，或能枉神筆於片石，則嚴子之風，復千百年未泯，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（范集卷十，與邵鍊先生！）

由此觀之，則知文正雖愛藝術，但未使其人生藝術化，而使其人生道德化，蓋其立身處世之志節爲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（范集卷八，岳陽樓記）。若云藝術化人生爲道家之本質，則文正道德化人生之作爲誠合於儒家之宗旨矣（註八）。

文正之人生雖屬道德化，但其頗能鑑賞藝術作品，而鑑賞藝術時，仍必以道德爲其基底。茲以其覆曹都官之函爲例，如：使介一至，手筆爛然，金石其辭，雪霜見志，斯足以使吾道拳拳矣（范集卷十，與曹都官）

案：文正既能够寓功業於德業，則當然能够寓藝術於道德。換言之，恭觀文正之遺墨後，所以能令人「肅然起敬，悚然汗下」者（范集補編卷三），固由其「筆法精妙，清古入神」（此爲藝術之一面）；更由其「學問淵源，立朝大節」（此爲道德之一面），如明代劉良曰：

魏國文正公書韓昌黎伯夷頌一通，筆法精妙，清古入神，雖鍾、王、顏、柳不過也。余聞書藝也，君子貴之，藝之美也；況大賢之手澤傳於後，與世俱存。公之在盛宋，而其名天下重之，不特文章翰墨也；而學問淵源，立朝大節，世未必盡知之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文正之手澤所以能够「傳於後」而「與世俱存」者，最主要者爲其「心量之廣大高明」，「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」（朱文公文集卷三人，與周益公書）。亦唯有「廣大高明」之心量者，才能有此「筆墨淋漓」之手澤傳於後世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王心一語）；且唯有「青天白日」之品格者，才能令天下士子肅然而起「高山之仰」（同上，朱勳語）。而朱彥昌所以曰：「文正公筆蹟之重，重人也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；亦正因爲其「質性氣局，可比伊尹」（同上，司馬堯語）。蓋「曹操王敦桓溫未嘗書不佳也」，而所以「至今見者睡之」者？就是因爲彼無伊尹之質性氣局，尤無文正之心量品格；換言之，彼等沒有「文武忠孝，親親仁民之德」（同上楊敬惠語）。

文正之筆墨雖然淋漓而厚重，然其「落筆痛快沉著」，亦即在「痛快沉著」之筆法下，而能使其字蹟淋漓與厚重，所以則顯得「清勁有精神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羅志仁語）；這就是技巧與藝術。如有詩贊曰：

范公千載一人豪，小楷精分穎上毛；真蹟至今傳不朽，泰山北斗並爭高（同上，文潞公撰）。

昌黎辭爾雅，文正字精深；峻節清風頌，高山流水音（同上晏公殊撰）。

案：「泰山北斗」與「高山流水」者，正說明了文正筆墨之勻整與調合；蓋「泰山」或「高山」表示厚重，而「北斗」有其光芒，「流水」表其煥發。而光芒與煥發者，則爲一種內發的力量有以使然；而此一力量乃發自文正之内心，以行之於天下者。如有詩贊曰：

墨胎事遠頌聲在，青社人鈔楷法新；尺素那侯還范氏，先憂天下亦同仁（范集補編卷三，趙孟頫撰）。

文正之筆法所以博得「素書銛鋒」之美之力者（同上盛彪語），而其內在力量則爲「惓惓之意實在國家」也（朱文公文集卷三八，與周益公書）。

文正之至性是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（范集卷五，靈烏賦）；而其作風是「理或當言，死無所避」（范集卷四，睦州謝上表）；所以被譽爲「剛直不撓」（註九）與「義則難奪」之人（註一〇）。明乎此，則知文正所以「筆力清挺」之根本原因所在，換言之，其所以「不默而生」與「死無所避」，以及「剛直不撓」與「義則難奪」者，在在表現其「忠貞」之節操。如清代高士奇曰：

文正公忠貞貫日月，事功炳史冊，甚正書伯夷頌、筆力清挺，世所罕覩。又有文（彥博）富（弼）杜（衍）晏（殊）諸公，及忠宣（文正次子純仁）昆仲跋尾，聿爲巨觀。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案：於文、富、杜、晏及忠宣昆仲之跋尾陪襯中，而猶能顯出文正之「筆力清挺」，以至於「世所罕覩」者；可見其字正如其人，亦是「剛直不撓」與「義則難奪」。此即其「忠貞貫日月」之節操，化着「至大至剛」之正氣而「塞於天地之間」有以致之（孟子，公孫丑上）。是知大賢之執筆運墨，用於其腕力指力者少，而用於其心力氣力者大。正因此，所以高士奇「展閱再四，想見公之豐神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以論文正之「豐神」，則高士奇乃「想見」者，而宋代諸賢乃親見之者，如富弼謂其「威斷如神，吏縮手不敢侮其奸」（范集，褒賢一，富撰墓銘）；張唐英則曰：「仲淹明敏通照，決事如神」（同上，張著名臣傳）。而高氏之想見，既同於宋賢之親見，則書法確乎可以象徵人之性格與資質，以及修養與作風。

文正之筆所以能够「發其光華」，而「如日月之垂天」者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韓與語）；就是因其胸襟高闊，意念超脫。換言之，由於「其化也廣，其旨也深」，故能「不以己欲爲欲，而以衆心爲心」（范集卷五，用天下心爲心賦）。質言之，雖然執筆者爲我，而行書之意境却須無我。杜本最能體會到此一層，故曰：

古之君子之於學也，至於成己成物，其於天下國家，則曰功成治定；所謂言之必可行也，行之必可言也。蓋物格知至，而至於國治天下平者如此，非苟以爲言而已。世之君子，何其言之詳而卒不見其成功耶！若文正范公，則所謂能言之而能行之者也；觀其所書韓子伯夷頌，豈特筆墨之妙，其爲萬世之慮也深矣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爲贊頌文正之書法，却由「成己成物」，「功成治定」說起，經由「言之必可行，行之必可言」，而說到「其爲萬世之慮也深矣」。而真正講到書法者，則只有「筆墨之妙」四字；至於其筆墨何以會妙？以及妙到何種境地？則盡在不言之中。蓋惟有作

者能够「達彼羣情，洞夫民隱」，則其作品始可「侔天地之化育，配日月之照臨」（註一二）。再如泰不華亦與杜本同一觀點，能由其品性而論其書法：

觀魏國出處，始終大節，一合乎道，其豐功盛德，煥乎簡策，若日星之不可掩，山嶽之不可齊，與天地相爲悠久，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與！今觀魏國所書伯夷頌，筆法森嚴，直可與黃庭樂毅等書相頽頽。是則魏公非特於德行功業，超然傑出，其於書法，亦造乎其極者也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案：泰不華極論文正「始終大節，一合乎道」；云其豐功盛德「若日星之不可掩，山嶽之不可齊」；並謂「其窮理盡性亦至於命者」，而可「與天地相爲悠久」。至於談及書法者，亦僅「筆法森嚴」四字。這絕非變本爲末與移始作終，乃正是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之義（大學第一章）。

夏原吉贊文正之書法「遒勁嚴整，妙絕前代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；戴蒙正贊曰：「文醕筆勁，既美且箴」（同上），胡助贊曰：「言皆至理，書特清勁」（同上）；黃庭堅則曰：「筆精而瘦勁，自得古法」（同上）。此四人所論者，可稱大同小異，而四人各皆云一「勁」字，此爲其大同之處。由此可知文正之字所以精與所以美者，確乎表現在「勁」字上；而欲其書法清勁有力者，則必須筆墨厚重；而於厚重之中則顯「其有弘毅之器」，故能「爲政尚忠厚，所至有恩」（宋史卷三四，范仲淹傳）。此正是誠於中而形於外之意，故曰：「誠則形，形則著」（中庸，二三章）。文正所云「性以誠著，德由明發」者，當亦本乎此而言者（范集卷五，自誠而明賦）。蓋唐末五代以來，士風浮薄，崇尚華靡（宋史卷二六三，李穆傳），爲矯世厲俗，故文正特於厚重中顯其志操，此乃「誠者不勉而中」之義（中庸，二十章）；故文正曰：「存乎誠而正性既立，貫乎明而盛德乃宣」（范集卷五，自誠而明賦）。又因宋興百餘年，而積於五代之弊，士子之書法仍然「寂寞不振」（宋，桑世昌，蘭亭博議）（註一二）。所以文正乃藉其筆力以擊破寂寞，而挽回頽勢；故其書法頗能寓生動於厚重之中，如康熙間其二十世裔孫范承勳，所述者最能表其真蹟：

先魏國所書道服贊，結構謹嚴，有龍跳虎臥之勢；筆力之最勁者，搘笏垂裳，德容如可想見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

蓋天下事「動則變，變則化」（中庸，二三章）故文正曰：「大道卷舒，非龍何如」（范集卷五，老子猶龍賦）。唯令人「益

可玩味」者，乃其「美不忘規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胡助語）；所以在其「龍跳虎臥之勢」中，仍然「德容如可想見」。明乎此義，則就不會懷疑載仁既贊其「端嚴濟森，柳骨顏筋」，又贊其「龜文龍鱗，或翔或處」；似乎爲動靜矛盾之語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）。吳立禮所云「淳重清勁，如其爲人」者，亦正是此義（同上）。以「少有志操」著稱的文正，「豈率易爲人下筆者哉」（同上，孫克弘語）！其翰墨留天地間，所以「如精金美玉，人咸知愛重」者（同上，李祁語），正因其「得道於心」，故能「從容中道」，所以雖筆墨之遺澤，亦「將百世不泯矣」（范集，補編卷三，李祁語）。

貳、文學美而勁

（甲）存誠載道

〔一〕

「國之文章，應於風化，風化厚薄，見乎文章」；故文正呼籲「救斯之薄，而厚其風化」（范集卷十，奏上時務遺）。蓋「文章以薄，則爲君子之憂，風俗其壞，則爲來者之資」（范集卷九，上議制舉書）；何況「功名可存於不朽，文章可貽於無窮」。以論其時效，則可令人「因感激而興」，以論其影響，則可興懷「垂千古之志」（同上，上張右承書）。可見文體之衰飒，不但關係氣化，尤其關係國運，所以文正「何嘗一日不以文章自任哉」（范集毛一鷺序）；然而五代以還所以「文體薄弱」，則由於「古文未興」，論究其故，則因「五代以來，夷狄干戈日沸，中國不復講求俎豆絃歌之事」（范集毛一鷺序）。宋承五代之後，有識之士，莫不急思救治之，如文正於尹師魯河南集序（范集卷八）中說：

懿僖以降，寢及五代，其體薄弱，皇朝柳仲塗（開）起而靡之，髦後率從焉；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，有文於天下者多矣。洎楊大年（億）以應用之才，獨步當世，學者刻辭鏤意，以希鬍鬚，未暇及古也；其間甚者，專師藻飾，破碎大雅，反謂古道不適於用，廢而弗學者久之。洛陽尹師魯（洙）少有高識，不逐時輩，從穆伯長（修）游，力爲古文；而師魯深於春秋，故其文謹嚴，辭約而理精，章奏疏議，大見風采，士林方聳慕焉。逮得歐陽永叔（修）從而大振之，由是天

下之文，一變而古，其有深功於道歟（參見邵伯溫：邵氏聞見錄卷十五）。

雖然「大見風采」，「一變而古」，但由於積習過久，不易驟革，則士子爲文之通病，仍然是「刻削傷於朴，聲律薄於德」；亦卽以「聲律爲能」，故「華而不實」（河東集卷五，上王祐第三書）。譬如梁周翰，高錫，范皋等，雖皆「習尚淳古」，而與柳開「齊名友善」，但其爲文依舊偏近「五代體」（宋史卷四三九，梁周翰傳）。「其故在於幼之學焉。無其天之性也」（河東集卷五，上王祐第三書）；所以雖然「號能古文」，亦不過「以斷散拙鄙爲高」（葉適：習學記言卷四九）。

文正之前，倡導古文最力者，則爲「直以韓愈爲宗尚」的柳開，故張景曰：「時韓之道獨行於公，遂名肩愈，字紹先」（河東集卷十六，行狀）。後又欲超越韓子而直紹孔子，以宏闡仲尼聖道之途爲己任，故又自號爲「仲塗」；既學韓文，又習六經，務必發揚儒家之道統與文統於當世，故曰：「吾之道，孔子、孟軻、揚雄、韓愈之道，吾之文，孔子、孟軻、揚雄、韓愈之文也」（同上卷一，應責篇）。然而世以柳開之文「體近艱澀，明而未融」（四庫提要卷二九，別集類五），以致「學者刻辭鏤意，有希鬢鬚，未暇古也」（范集卷八，河南集序）。所以柳開則爲之辯釋而定其義曰：

古文者，非在辭澀言苦，使人難讀誦之；在於古其理，高其意，隨意短長，應變作制，同古人之行事，是謂古文也（河東集卷一：應責篇）。

然由於柳開倡義過高，士子不易「研窮意義」以風從之，流弊所至，正如魏泰東軒筆錄（卷十）所云：「比來舉子浮薄，不求義理，務以敏速相尚」（參見宋史卷三〇六，孫何傳）。蓋當時士子多爲擅長駢文，而兼作古文者（邵氏聞見錄卷七及卷十五）；於是楊億則以「應用之才，獨步當世」，以之雜糅混合而創造「西崑體」（范集卷八，河南集序）；雖然惟務雕琢與藻飾，但却一時形成景德、天禧間的文壇主流（劉攽：中山詩話）。於是引起道學之士，蔚爲復古運動，直至姚鉉「毅然矯五代之弊」，因其不錄四六近體，而惟取散文古體以編唐文粹，故曰：「與穆修、柳開相應者，實自鉉始」（四庫提要卷三七，總集類一）。惟「今世士子習尚淺近，非章句聲偶之辭，不置耳目」，以至於「浮軌濫轍，相跡而奔，靡有異塗焉」（河南穆公集卷二，答喬適書）。所以穆修雖然矯時革俗，力倡古文（習學記言卷四九，及曲洧舊聞卷四），然而「衆人又排詬之，罪毀之，不目以爲迂，則指以爲惑；謂之背時遠名，濶於富貴」（河南穆公集卷二，答喬適書）。終由其守之以固，持之以堅，所以

「則一傳爲尹洙，再傳爲歐陽修，而宋之文章，於斯極盛」（四庫提要卷二十九，別集類）。而尹洙之文章「古峭勁潔」，可「一挽五季浮靡之弊」；故曰「有宋古文（歐陽）修爲巨擘，而（尹）洙實開其先」（同上）。文正所謂「由是天下之文一變，而其深有功於道歟」（見前引）！即指此而言。

其實早在尹洙甫中進士之時（天聖元年，公元一〇一三），當時歐陽修尚未從尹洙習古文，文正卽已指出文弊，並提出救治之道。如：

我聖朝千載而會，惜乎不追三代之高，而尚六朝之細。然文章之別，何代無人，蓋時之所尚，何能獨變！大君有命，孰不風從？可敦諭詞臣，興復古道，更延博雅之士，布於臺閣，以救時文之薄，而厚其風化也（范集卷七，奏上時務書）。蓋文正認爲所以「詞多纖穢，士惟偷淺」，以至於「言不及道，心無存誠」者；乃由於「士林之間，患不稽古」，因之而「委先王之典，宗叔世之文」（范集卷九，上執政書）。所以其救治之方針是：「可敦諭詞臣，興復古道；更延博雅之士，布於臺閣」。進之則提出其具體辦法。如：

儻使呈試之日，先策論以觀其大要，次詩賦以觀其全才，以大要定其去留，以全才升其等級。有講質者，則加考試，人必強學，副其精舉；復當深思治本，漸隆古道（范集卷九，上執政書）。

案文正以此途徑而矯治「專事藻飾，破碎大雅」之崑體文弊，雖未蒙朝廷採納，但却爲歐陽修改革古文之先驅；更由文正德望之隆，致引起「好古篤行」之士的風行景從（續長編卷一〇六，天聖六年）。其影響力終於上達朝廷，使其深知「浮誇靡曼」、「無益治道」（同上），乃特於天聖七年（公元一〇二九）正月下詔指出「褒博之流、習尚爲弊，觀其著撰，多涉浮華」，並特申「當念文章所宗，必以理實爲要，探典經之旨趣，究作者之楷模」（宋會要卷一〇六，選舉三）。時學者如狄遵度、孫明復、石曼卿、海堯臣、蘇舜卿等，誠心宗道，互相砥礪，於是古文聲勢驟盛（宋史卷三一九，歐陽修傳）。石介更著怪說以徹底掃蕩崑體，謂其文「綴風月、弄花草、淫巧侈麗，浮華纂組」；乃是「剗鋟聖人之經，破碎聖人之言，離析聖人之意，蠹傷聖人之道」（石徂徠集卷下）。雖然石介乃以光大柳開尊韓宗經與文道合的傳統文學爲己任，但由其激烈得近似過火，即連歐陽修都覺得其「自許太高，詆時太過」（石徂徠集卷上，答歐陽永叔書）。何況石介雖倡古文，但其所爲奇澀難讀，張方

平評其「逾越規矩，惑誤後學」（樂全集卷二十，請誠勵舉人文章）。蘇軾譏以「餘風未殄，新弊復作」（東坡續集卷十一，謝歐陽內翰書）。雖如此，但由其掃蕩之魄力，亦頗有廓清文壇之貢獻。所以至歐陽修「倡爲古文，以變崑體，學者翕然從之」（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十，引呂氏家塾記）。

迨寶元（公元一〇三八）以後，西夏與契丹「復相交搆，夾困中國」（范集卷二，邊事）；爲擢進英才，以濟時艱，文正以爲「束以聲病，專於記誦，則不足盡人才」（續長編卷一四七）；故於執政時，則毅然領導「慶曆改革」，如田況儒林公議（卷下）載曰：

慶曆三年（公元一〇四三）既放春榜，時議以爲取士浮薄寢久，士行不察，學無根源，宜新制約，以救其弊，執政（即

文正）與言事者意頗符同，乃勅兩制及御史臺詳定貢舉條制（參見文獻通考卷三、選舉四，及續長編卷一四七）。

案文正「復古勸學」之基本措施爲「興學校、本行實」（續長編卷一四七，慶曆四年）。惟翌年（慶曆五年）因文正之自請外戍，則其一番心血變爲「且如舊制」矣（續長編卷一五五）。由於保守派惟重詩賦而攻擊策論，則朝廷亦只得以詩賦駢文取士（續長編卷一六四）。幸則秉承文正意志的歐陽修，仍然堅持古道，力倡古文；而文正之友人胡瑗則以經術聖道之文，明體達用之學以授天下英才（宋元學案卷一，安定學案）。友人孫復則以「文者，道之生也，道者，教之本也」以倡於天下士子之間（孫明復小集卷上答張洞書）。而梅堯臣李觀等名士，亦皆同反西崑弊習，同倡韓柳古文。於是風氣蔚起，而古文勢盛矣。直至歐陽修知貢舉，始不懼危難，毅然改變文格，以抵於成功。如史載：

嘉祐中，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，驟爲怪儈之語，學者翕然效之，遂成風俗。歐陽公深惡之，會公主文，決意痛懲，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，時體爲之一變（沈括：夢溪筆談卷九）。

爲所推譽，皆不在選；羣薄之士，候於晨朝，羣衆詆斥之，至衛司遷卒不能止。或爲祭歐陽修文投其家，卒不能求其王名置於法（續長編卷一八五）。

在歐公主試之下，一時古文聖手如曾鞏，二蘇（軾轍兄弟）與王安石等，均得及第而躍登文壇，於是則士子爭效，而古文鼎型矣。五代之類風弊習，終於廓清，可說文正發其端而舉其義於前，歐公則蔚其風而成其功於後也。

蔡增譽贊曰：「有文正之蕭寺齋鹽，而後有文章之文章功業」（范集蔡序）（註一三）。此言極具意義，蓋文正之修養境界，確乎是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（范集卷八，岳陽樓記）；其一生之文章功業，乃完全發於至誠與積於至憂。如：

信聖人之書，師古人之行；上誠於君，下誠於民（范集卷九，上晏侍郎書）。其着意與構思之際，無不本着人溺已弱與人飢已飢之恕道精神，以關懷着社稷民生。

敢不孜孜於善，戰戰厥心，求民疾於一方，分國憂於千里（范集卷四，鄧州謝上表）。

敢不夕惕三省，寅恭一心，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，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（同上謝轉禮部侍郎表）。

由此悲天憫人之儒家恕道作其內在動力，故其「遺表」中仍望仁宗「上承天心，下徇人欲」，期能「制治於未亂，納民於大中」（范集卷四）。至於其詩，雖多觸景生情而作，但亦必著「兼濟加澤之心」（黃微：碧溪詩話卷七）。如：

一棹免於葉，傍觀亦損神，他時在平地，無忽險中人（同上）。

如此「醇醇而弗醨」，「安安而弗欹」之雄渾筆勢，真可稱爲「大儒之文」與「君子之器」，以其誠樸之心，故薛雪贊之爲「正人君子」（薛著一瓢詩話）；以其沈鬱之筆，故吳喬稱之曰「直是杜詩」（吳著園爐詩話）。

文正曰：「文以鼓天下之動，學以達天下之志」（范集卷九，上張右函書）換言之，此乃以「聖賢存誠」之心，而「思與天下同其安樂」之語；而文正所以說「然非思之難，致之難矣」！則單視思之者與致之者是否具有「聖賢存誠」之心（范集卷九，上執政書）。譬如其岳陽樓記與遺表等作，都是憂與誠交織成之筆墨。以視其前者，如：

若夫霪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；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。日星隱耀，山岳潛形；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；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。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，感極而悲者矣（范集卷八）。

案此本爲寫景之文字，所以吾師王夢鷗先生論其「結構特色」曰：「其爲文體，則駢散互用；敍事實則運散體之文，振其輪廓；言景象則以排偶之語，繪其細部」（王著：傳奇校補考釋）。但其每一句中都涵蘊着誠心憂意，所以古文通論謂其「沉鬱悽然」（中華書局五五年版）。再論其後者（即「遺表」），如：

蓋念所惜者盛時，所眷者明主，雖性命之際，已能自通，然君臣之間，豈易忘報。但無怛化，以竭遺忠，敢憚陳於緒言

，庶無負於沒齒。伏望階下調和六氣，會聚百祥，上承天心，下徇人欲；明慎形賞，而使之必當，精審號令，而期於必行；尊崇賢良，裁抑僥倖，制治於未亂，納民於大中（范集卷四）。

案此全爲寫情之文字，但其情者，乃是基於「憂心」所發出之「眞情」（誠）。所以蔡增譽贊其「體要典確，辭旨精粹」（范集，蔡序）；韓琦贊其「宏謀大策，出入仁義」（范集，韓序）。平步青曰：「文弊於宋，奏疏至萬餘言」（霞外攟屑卷七）。而文正之奏疏，除「十事政疏」（范集卷一）與「上執政書」（范集卷九）較長外，餘者皆藉數百字以寫其「益天下之心」，達其「垂天下之志」（范集卷九，上張右丞書）。馮時可評宋儒之爲文，「嗜易而樂淺」與「貴直而少諷」（雨航雜錄卷上）。而文正基於憂而發乎誠，其文章所以淺而易言者，乃希望人能共體與共鳴。復由其「一德一心，弗愧弗負」之修養與志節（註一四），故其文章當然「貴直而少諷」。

其「憂」與「誠」所織作之詩句，更足顯示其忠君愛民與淑世安邦之宅心仁懷。蓋其希其君爲堯舜之君，希其民爲羲黃之民也（范集卷六，上漢謠）。如：

但願天下樂，一若樽前身，長載堯舜主，盡作羲黃民（同上，依韻答張太傅）。

因此特重視簡選地方官吏以善牧百姓，造福桑梓。因文正「爲文章論說，必本於仁義」（范集，毛一鷺序）；所以其選拔方吏之時，特令「各試文論二首，足以觀其才識」；不令更試詩賦，蓋「恐詞藝小巧，無補大猷」也（范集卷二，再乞召試王益柔等）。由其憂民之誠心所至，故能提出此一治本之辦法；換言之，由於愛民，故重擇吏。如：

仁與智可尚，忠與義可欽；吾愛古賢守，馨德神祇歆（范集卷六，閱古堂詩）。

惟有牧民官之清廉賢德，百姓才得幸福康樂，文正愛民之誠，與忠君之憂，可說「心似血」而「鬢成霜」；真是「碌碌嘲須解，循循弗敢忘」（范集卷七，依韻酬晏尚書）。其理想之民生景況，可由詩中略窺其情。如

千家溉禾稻，滿目江鄉田；我來動所思，致主愧前賢（同上晉祠泉）。

精誠所至與憂愛所交，則只能抱定「理或當言，死無所避」之志節，以報效國君（范集卷四睦州謝表）；甚至「一心自信，三黜寧逃」，亦不惜不懼（同上，謝賜鳳茶表）；仍然「居常苦節，動必危言」（同上，杭州謝上表）。如詩曰：

隴上帶經人，金門齒諫臣；雷霆日有犯，始可報君親（范集卷七，出守桐廬十絕）。

蓋文正認為只要君明臣賢，則開元盛世不難再映於慶曆之間，故其興感曰：「開元盛世今何在，尚有霓裳寄此花」（范集卷七），（感慨）。案文正爲樂天知命之人，故曰「有爲須報國，無事卽頤神」（范集卷七，醉別鄭侍郎）；又曰：「志意苟天命，富貴非我望」（范集卷六，酬曹使君）。由於其「詩畫對周孔，琴瑟親羲黃」之修養（范集卷六，書海陵文會堂），故有「耿耿金石性，霜雪不能老」之貞操（同上，寄題碧鮮亭）。其心爲「寸懷如春風，思與天下芳」；所以則「意君成大舜，千古聞禋香」；論其忠貞之表現，則是「立譚萬乘前，肝竭喉無漿」；甚至不惜「義士撫卷起，眦血一霑裳」（范集卷六，酬曹使君）。

復論文正之詞，雖爲感情之發抒，但亦是積於憂與基於誠而作者，茲舉其蘇幕遮一首以說明之於次：

碧雲天，黃葉地，秋色連波，波上寒烟翠；山映斜陽天接水，芳草無情，更在斜陽外。黯鄉魂，追旅思，夜夜除非，好夢留人睡；明月樓高休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（范集卷七，懷舊）。

表面視之，此爲一寫景詞，究實論之，却爲一抒情詞，尤其「休獨倚」與「相思淚」，更寫盡了誠心與憂意；其所以如此，正是因爲「山映斜陽」與「芳草無情」，蓋前者表示世道不明而後者隱指小人亂政（註一五）。所以黃寥園云：「文正當宋仁宗之時，剔歷中外，身肩一國之安危，雖其時不無小人，究係隆盛之日；而文正乃憂愁如此，此其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矣」（同上）。再如御街行一詞，其用心與構意亦頗似蘇幕遮；換言之，亦是寓忠誠於憂愁之中。如：

紛紛隧葉飄香砌，夜寂靜，寒聲碎，真珠簾捲玉樓空，天淡銀河垂地；年年今夜，月華如練，長是人千里。愁腸已斷無由醉，酒未到，先成淚，殘燈明滅枕頭欹，諳盡孤眠滋味；都來此事，眉間心上，無計相迴避（范集卷七，秋日懷舊）。案當時詞人都受五代與南唐影響，唯以哀婉之風調以寫景爲長（見馮延巳·藝概卷四）。惟文正能化景爲情，且寓情於景；尤其漁家傲一詞，更以蒼涼悲壯之旨義，以超出於當時詞風之籠罩。如：

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；四邊聲角起，千嶂裏，長煙落日孤城閉。濁酒一盃萬家里，燕然未勒歸無計；羌管悠悠霜滿地，人不寐，將軍白髮征夫淚（范集卷七，秋思）。

案此雖爲描寫塞外秋景之荒漠蕭涼，然其寓意却指韓琦之部將任福覆軍於好水川後（今甘肅隆德縣東），以致文正收復橫山（今

陝北境，綏遠草原之南緣）之計劃受挫者也。由其「歸無計」，「人不寐」，「將軍白髮征夫淚」等悲痛詞句視之，故霍佑謂其「句語雖工，而意殊衰颯」（霍者：歸田詩話卷上）。另如其功成名就而退居鄧州（今河南鄧縣）之後所寫之定風波與別銀燈等詞，雖然超然恬適之意境更高，飄逸曠達之情調更淡，但其由誠而憂與積憂於誠之苦心孤旨，則前後如一，始終不變。蓋其「寸心似鐵石，不羞賤與貧」（范集卷六，送張伯玉）；且「素聞前哲道，欲向聖朝行」也（同上，贈張先生）。

(三)

文正自幼即「文行過人，試爲第一」（皇朝事實類范卷三）。故仁宗贊其「早富藝文，素著名節」（范集補編卷二，拜資政殿學士敕）。又因其「出處困窮，憂思深遠；民之疾苦，物之情偽，臣相知之」（范集卷四，讓觀察使第三表）。所以申屠一稱其「有致君澤民之志則見乎文章」（褒賢集卷一，澧州讀書堂記）。而富弼則稱其「作文章猶以傳道名世，不爲空文」（褒賢集卷一，富撰莫誌銘）。誠然，對於「心無存誠」而「言不及道」之作品，文正則斥之爲「偷淺」之士與「纖穢」之詞（范集卷九，上執政書）。因爲文正爲「得道於心」之士（范集卷四，與周推官書），所以早就襄助晏殊繼承韓愈而以「文以載道」爲天下倡（陳善：捫虱新話卷九）；對於學行兼優、文道並茂之高士，文正至爲激賞，例如其寄贈林逋處士詩曰（載范集卷七）：

唐虞重逸人，束帛降何頻；風俗因君厚，文章至老淳（參見文正年譜·皇祐元年六十歲）。

其平時舉才擢士，亦以學行兼優，文道並茂爲先決條件，如其以「學術稽古，文辭貫道」而舉丘良孫；以「清心至行，不求聞達」而舉許渙；以「精思劇論，純誠直道」而舉張昇；以「詞才公器，周於致用」而舉滕宗諒；以「文學履行，有名於時」而舉張問；以「素蘊甚充，清節自處」而舉張伯玉等，皆是之（范集卷三，各舉狀）。案文正此一用心，正如蔡增譽所道出者：「士大夫不患無文，患無養也」（范集，蔡序）。是以欲究文正之文，須知文正之養；而文正之修己固如此，其舉人亦如此。正因文正之文乃來自文正之養，故曰有斯養始有斯文。必須養而後而成之文，始可稱之爲：「經以明道，若太陽之御六合焉；文以通理，若四時之妙萬物焉」（范集卷八，南京書院題名記）。職是之故，所以褒賢集贊文正「道德文章，功名事業，載在國史，實爲我朝第一流人物」（卷二，建置祠堂）。

「文以載道」之意義，即「文與學者，道之器也」（范集卷八，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）。文正認為政治之最高原則為「以至仁易不仁，以有道易無道」，而「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」；所以君子應該「百志弗違於道」（范集卷八，易義）。文正認為「任重道遠」之士，則必須「道心之微必究，王業之難必知」（范集卷八，皇儲資聖頌）。所以其主張以道為本，以文為末，惟有如此，才能去鄭復雅，撥亂返治。如曰：

予觀堯典、舜歌而下，文章之作，醇醨迭變，代無窮乎！惟抑末揚本，去鄭復雅，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（范集卷八，尹師魯河南集序）。

因為時代之復興，民生之康寧，在乎道以麗文與文以載道；所以文正對於道之「端」與道之「致」，均作闡釋之論。如：然則道者何？率性之謂也；從者何？由道之謂也。臣則由乎忠，子則由乎孝，行己由乎禮，制事由乎義，保民由乎信；待物由乎仁，此道之端也。子將從之乎！然後可以言國，可以言家，可以言民，可以言物，豈不大哉！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，揖讓乎聖賢，蟠極乎天地，此道之致也（范集卷八，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序）。

案：以上所述，可謂「率性之謂道」，既如此則自然應該「修道之謂教」矣（中庸第一章）。對此，文正釋之曰：

夫善國者……莫尚宗經，宗經則道大，道大則才大，才大則功大。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，安危之幾存乎易，得失之鑒存乎詩，是非之辯存乎春秋，天下之制存乎禮，萬物之情存乎樂；故俊哲之人，入乎六經，則能服法度之言，察安危之幾，陳得失之鑒，析是非之辯，明天下之制，盡萬物之情。使斯人之徒，輔成王道，復何求哉（范集卷九，議制學書）

可見唯有學界「文以載道」，才可使政界「輔成王道」。文正嘗曰：「唐正元、元和之間，韓退之主歸於文而古道最盛；僖、懿以降，寢及五代，其體薄弱」（尹師魯河南集序）；所以「今士林之間，患不稽古」；爲文則「不追三代之高，而尚六朝之細」（范集卷九，奏上時務書）。因之而爲詩嘆之曰：

裨竈方激揚，孔子甘寂默，六經無光輝，反如日月蝕；大道豈復興，此弊何時抑。末路競馳騁，澆風揚羽翼（范集卷六，四民詩）。

究其原因，則爲「今文庠不振，師道欠缺，爲學者不根乎經籍，從政者罕識乎教化，故文章柔靡，風俗巧僞」（范集卷九，議

制舉書）。蓋「質弊」而不救，則晦而不彰；文弊而不救，則華而將落；故主張「文弊則救之以質，質弊則救之以文」（同上，奏上時務書）。乃於天聖五年（公元一〇二七）上書曰：「師道不振，斯文銷散，由聖朝之弗救乎」（范集卷九，上執政書）！復於天聖八年（公元一〇三〇）再度書曰：「聞前代盛衰，與文消息，觀虞夏之純，則見王道之正；觀南朝之麗，則知國風之衰；惟聖人質文相救，變而無窮」。因之而力請朝廷「思救文弊，興復制科」（范集卷九，議制舉書）。

文正爲文固主張存誠載道，爲詩亦復如之。蓋文正雖爲詩人，並與詩人爲友（註一六），但其作詩則絕非爲抒情景，乃是爲恤蒼生；其認爲「政者爲民而設，民者惟政是平」；甚願「無一物不得其所，無一夫不遂其性」；故曰：「振窮恤貧，必俯從衆望，發號施令，實允協於羣情」（范集卷五，政在順民心賦）。正因如此，所以其文其詩，都是「不以己欲爲欲，而以衆心爲心」（范集卷五，用天下心爲心賦）。如：

松桂有嘉色，不與衆芳期，金石有正聲，詎將羣響隨；君子著雅言，以道不以時（范集卷六，謝黃總太傅見示文章）。詩之妙境，就妙在靈處，亦卽觸景生情之心靈發動；對此，文正並不反對，但應不脫離時代，不脫離社會，故曰：「如孟東野之清苦，薛許昌之英逸，白樂天之明達，羅江東之憤怒；此皆與時消息，不失其正者也」（范集卷八，唐異詩序）。其對文，固主張紹聖復古，對詩亦復如此，如云：「斯文也，旣格乎雅頌之致；斯樂也，亦達乎韶夏之和」（范集卷八，賦林衡鑑序）。俾可以「上以德於君，下以風於民」；以至於「動天地而感鬼神」（唐異詩序）。但「五代以還，斯文大剝，悲哀爲主，風流不歸」；「以至靡靡增華，愔愔相濫，仰不主乎規諫，俯不主乎勸諫」（同上）。所以其極力呼籲「由有唐而復兩漢，而兩漢而復三代」（賦林衡鑑序）；以期「大雅君子，當抗心於三代」；俾使「天下有道，無憤惋之作」；如此方可使「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，國風之正也」（唐異詩序）。釋言之，詩之功用應在助政府行仁政，俾人民得康阜；亦卽「使天下庠序，視此而興，濟濟羣髦，咸底於道」（范集卷八，南京書院題名記）。故曰：「詩之爲意也……羽翰乎教化之聲，獻酬乎仁義之醇」（唐異詩序）。基於此義，以觀其詩，則如：

百年奇特幾張紙，千古英雄一窖塵，惟有炳然周孔教，至今仁義浸生民（范集卷八，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述）。

案文正之詩，無論抒情或寫景，總必寄誠而托道，其認爲詩人或有「非窮途而悲，非亂世而怨」者，皆是「因人之尚，忘己之

實」；以至於「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，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」所致（唐異詩序）。故主張「稽四時之正，筆而爲經；考五聲之和，鼓以爲樂」；期得「言依聲而成象，詩依樂以宣心」；俾可「感於人神，穆乎風俗」（賦林衡鑒序）。案文正以存誠載道而爲詩文之論，乃宋儒之共同心聲，如柳開曾曰：「文章爲道之筌也」（河東集卷五，上王祐學士第三表）。穆修曾曰：「學乎古者所以爲道」（河南穆公集卷二，答喬適書）。惟文正學養深，交游廣，而影響力亦最大，其友人中，如孫復曰：「文者，道之用也」（孫明復小集卷上，答張洞書）。石介曰：「道德，文之本也」（石徂徠集卷上，上蔡副樞書）。李觀則云：「文者豈徒筆於章句而已，誠治物之器也」（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二七，上宋舍人書）（註一七）。後經歐陽修、蘇軾、王安石請公，繼承文正之意志，努力推動，於是掃五代之類風積弊，而建立起經世濟用之宋詩體格（註一八）。

（乙）典雅純實

〔一〕

文章要美要勁，則需以氣以勢；勢者乃附於氣，當然「以氣爲主」（曹丕·典論）。韓愈所以能一振八代之衰者，固因其在文體上褫駢儼，追周漢，尤因其用力古文，綜覈而鎔化之，故其行文頗有司馬遷揚雄之氣勢，以致「後學之士，取爲師法」（舊唐書·韓愈傳）。名亞於愈之柳宗元，其「下筆構思，與古爲侔」；而氣勢之「雄深雅健」亦「似司馬遷」。故當時士子「不遠千里，皆隨宗元師法」（舊唐書·柳宗元傳）。所以爲文雖然「以意爲主，以氣爲輔」（唐文粹卷八四，杜牧答莊充書）；但應「使五彩並用，而氣行於其中」（唐文粹卷八四，柳冕答鄭使君書）；蓋「氣生則才勇，才勇則文壯，文壯然可以鼓天下之動」（同上，答楊中丞書）；此所謂「勇」與「壯」者，就是由「氣」而生的「勢」。文章能「如千軍萬馬」而使「聽之者悅用」與「觀之者不厭」者，就在氣勢之交織與變化，故李德裕曰：「鼓氣以勢壯爲美」，而「氣不可不貫」（會昌一品集·文章論）。而司馬遷的文章，所以「馳騁數千載，若有餘力」者；就是因爲其能貫其氣而壯其勢（唐文粹卷八四，裴度寄李翹書）。宋代諸子，亦能運其氣勢於文章之中，如尹洙曰：「大抵文字所忌者，格弱字冗」（潘永因·宋裨類鈔卷五）。但其於氣勢之外，頗能重視務實，認爲「浮誇靡蔓之文，無益治道」（續長編卷一〇八），所以主張「文章之變（應）與政通」

(續長編卷一五八)，亦即爲文者應當「務明先聖之意」(續長編卷一〇九)。其強調爲文務實之旨義，就是對時代盡心，對歷史負責，其所自期自責者，爲「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」(歐陽永叔集三冊，春秋或問)。所以其爲文之原則固是：「文字簡略，止於大節」(同上，八冊，與杜訟論祁公墓誌銘)，但亦「言以載事，而文以飾言」(同上，八冊，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)。當然不但期其「表現於後世」，並且「期於久遠」(註一九)。由其負責之態度出於至誠，所以歐陽修爲文，必「改正盡善，方出之示人」(註一〇)；蓋其「唯恐不爲世之信也」(歐陽永叔集，三冊，薛塾墓表)。

文正主張天下之士「當於六經之中，專師聖人之意」(范集卷九，與歐靜書)。故曰：「使天下賢俊，翕然脩經濟之業，以教化爲心，趨聖人之門，成王佐之器」(范集卷九，議制舉書)。此乃其爲文「務實」之標明。所以其固然認爲作品應該「文詞高妙」(范集卷十一，祭滕待制文)，但尤認爲作者應該「發于誠性」(同上，祭謝舍人文)。基於此義，故其旣贊丘良孫「文辭貫通」(范集卷三，丘良孫應制舉狀)，又贊陳堯佐「得聖賢之粹」(范集卷十一，太清宮九詠序)，但其更強調「辭約而理精」(同上，尹師魯河南集序)；蓋「務實」的文章，端在「情須可達，辭貴得宜」(范集卷三，舉歐陽充經略掌書記狀)。文正之文章所以「如火之熱，如水之濕」；以至於「天下信其誠，爭師尊之者」(蘇東坡集卷二四，范文正公集序)；就是因爲「公之言之文，皆仁義之布濩流衍」，不論「雄文大冊，小篇短章，靡不燦然一出於正」(褒賢集卷三，吳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講義)。換言之，由於文正斥「空言」而重「實效」，所以其爲文立說皆是「貫通經術，明體達用」者，如四庫提要贊之曰：

仲淹人品事業，卓絕一時，本不借文章以傳，而貫通經術，明體達用。凡所論者，一一皆有本之言，固非虛飾詞藻者所能，亦非高談心性者所及。觀仲淹之人與仲淹之文，可以知空言實效之分矣(集部，別集類五)。

案文正既不「高談心性」，亦不「虛飾詞藻」，其平生「事業」，確乎由其卓絕之「人品」。其文章之壯美，所以「有怒流出峽，峻嶺摩霄之勢」者(范集，蔡增譽序)；乃完全由其修養之高深，以致其人品之卓絕。對此，俞翊稱其爲「天地之正氣」，而蔡增譽則贊其爲「浩然之氣」。如：

雖筆端游戲之餘，而典雅純實，可以經世而出治，垂文而行遠；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，故文亦如之(范文正公別集卷四，俞翊跋)。

案文正之文章所以「典雅純實」者，乃「得之浩然之氣全耳」；此確實爲兩相貫義之語。釋言之，其文章所以「典雅」者，乃由其人格之「純實」；亦正因其人格之「純實」，所以其文章亦寓「典雅」於「純實」。換言之，其作品就是寫出了作者之心，而作者亦正在作品之中；兩者雖爲二而實爲一，故曰得之浩然之氣「全」耳（范集蔡序）。

因有天地間之浩然正氣、充實於文正之肺腑之中，其文章之壯美而強勁，固因貫其氣而成其勢；詩句雖然音節和諧，易於感人，但在韻律之間，亦必行氣運勢，始可動人。對此，文正論之曰：

詩之爲意也，範圍乎一氣，出入乎萬物，卷舒變化，其體甚大。故夫喜焉如春，悲焉如秋；徊徨如雲，崢嶸如山；高乎如日星，遠乎如神仙；森如武庫，鏘如樂府（范集卷八，唐異詩序）。

可見天下萬事萬物皆可取作詩材，而詩之變化又是風雲萬狀；但其雖然「出入乎萬物」，惟却「範圍乎一氣」。闡而言之，作者化其自己爲「一氣」，而「出」於「萬物」與「入」於「萬物」，却不爲任何一物所囿；如此自然「卷舒變化，其體甚大」。讀其詩則悠悠然隨其氣而「出入」，漸漸然被其氣所「範圍」。如此則當然欲罷不能，欲退不得；唯有隨詩之「卷舒」爲「卷舒」，隨詩之「變化」爲「變化」；換言之，讀者自必因詩而共鳴，因詩而起舞矣。例如：

胥也應無憾，至哉忠孝門，生能酬楚怨，死可報吳恩；直氣海濤在，片心江月存，悠悠當日者，千載祇慙魂（范集卷七，伍相廟）。

念此孤鳴鶴，聲應來遠方，相期養心氣，彌天浩無疆；鋪之被萬物，照之諧三光，此道果迂濶，陶陶吾醉鄉（范集卷六，鄱陽酬曹使君）。

案：前者說明伍子胥爲忠爲孝，早置生死於度外，「直氣海濤在，片心江月存」，固然有其配詞之和諧美，尤其實爲其浩然之氣勢美。後者乃文正三度被貶於饒州時（今江西鄱陽縣），所寄酬於泉州（今福建晉江縣）曹使君者；可見文正曾與曹君「相期養心氣，彌天浩無疆」。不經此等工夫，怎敢獻身而自許恩將「被萬物」、德將「諧三光」？正因文正養其氣而勵其志，所以致其「意君成大舜，千古聞蘂香」；且被志之所帥，氣之所充，而「立譚萬乘前，肝竭喉無漿」；但文正之修養境界，已可「持其志無暴其氣」（孟子，公孫丑上），所以其寄酬曹君之詩乃寫其內中之「寸懷如春風，思與天下芳」也（范集卷六，鄱

陽酬使君)

文正之詩文，皆因寓氣於變而形成一種氣勢之美，至其詞賦，亦因寓作者於作品之中而一掃五代艷婉頹靡之習。由其剛氣之貫通，故能寫出「人不寐，將軍白髮征夫淚」之詞句（范集卷七御街行）。由其柔氣之運行，故能寫出「一品與千金，問白髮如何迴避」之詞句（同上，剔銀燈）。蓋文正固然「少有志操」而願為國立功，但又有「弘毅之器」而能超然物外（見宋史卷三一四，范仲淹傳）。以上兩詞之末句，皆為寓義於此者；若非養氣之工力所致，焉能寫出如此之文詞！至於賦，尤有一種天地正氣貫行其中，如文正曰：

君不見仲尼之云兮，予欲無言，繢繢四方，曾不得而已焉。又不見孟軻之志兮，養其浩然，皇皇三月，曾何敢以休焉。此小者優優，而大者乾乾（范集卷五，靈烏賦）。

案：文正之養氣工夫，乃「於六經之中，專師聖人之意」者（范集卷九與歐靜書），故其既遵「仲尼之云」，又持「孟軻之志」；亦正因如此，故能「養其浩然」，而「以萬靈為心，以萬物為體」（范集卷九，上執政書）。以其「反心而誠」之修養境界，故能賦出「出入乎萬物」而「範圍乎一氣」之美句來。如：

惟神也感而遂通，惟化也變在其中，究神明而未昧，知至化而無窮。通幽洞微，極萬物盛衰之變；鉤深致遠，明二儀生育之功（范集卷五，窮神知化賦）。

案：「感而遂通」與「變在其中」之義，皆為「大人」者以其磅礴之正氣，在默化、在運行。故曰：「變動不居，適內外而無滯；廣大悉備，包上下而弗遺」；此之謂「鼓之舞之以盡神」（范集卷五，易兼三才賦）。

(2)

王禹偁曰：「文自咸通後，流散不復雅，因仍歷五代，秉筆多艷冶」（小畜集卷四，哀高錫）。周亮之亦曰：「宋初之詩，沿五季卑靡之習，詞多率易」（周著書影卷十）。當時之詩文能如林逋之「平淡邃美，而趣向博遠」者極稀（呂留良宋詩鈔、和靖詩鈔序）。連寇準之作品都「含思悽惋，綽有晚唐之致」（四庫提要卷二九，別集五，寇忠愍公詩集）。所以文正痛陳時弊曰：「五代以還，斯文大剝，悲哀為主，風流不歸」（范集卷八，唐異詩序）。針對此一時弊，所以文正之寫作，極為振

作，極爲緊縮；振作中現其文采，緊縮中見其剛勁。如：

處事未精，發言多率；智者千慮而有失，愚臣一心而豈周；情雖匪他，罪實由己。然而有犯無隱，惟上則知；許國忘家，亦臣自信（范集卷四，饒州謝上表）。

案：文章之間，處處顯示爲國以謀己，與爲國以責人；既不計私利，亦不顧私情。雖然因「慮而有失」而「發言多率」，但仍本其「許國忘家」之至誠，而「有犯無隱」。雖然文字緊縮而語氣振作，亦足以盡見其文采之姿與剛勁之氣。更令人想到：文正則文采與剛勁兼而有之，且文如其人與人如其文，而汲黯與裴度雖皆「忠良」，然其風格與氣度之真之美似見遜於文正也（同上，潤州謝表）。

文正之才，雖以「經濟而兼資文武」見長（註二），而非以「競短長於筆墨之間」者（註三），但其設喻取譬與用字遣辭，均能匠心獨造而超俗入化。如：

志在投秦，入境遂稱於張祿；名非伯越，乘舟偶效於陶朱（龔明之，中吳紀聞卷二）。

此乃選用國史中兩位能臣名相改易姓氏之典故，以影射自己曾隨母改嫁，初以朱說爲姓名之事。但其緊縮之手法是：雖述自己而又隱藏自己，且雖藉范蠡、范睢以述自己而又不明示蠡、睢。至其選聲着色與對律稱韻者，則尤達於化境。再如嚴先生祠堂記，雖亦寓喻於詞，而造句精切；但却另具風格而別令崇賞。如：

蓋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；光武之器，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（范集卷八）。

述嚴子而述其「心」，述光武而述其「器」；雖不云其心之高潔，而只云「出乎日月之上」；雖不云其器之廣大，而只云「包乎天地之外」。最後則以「高」與「大」相互之關係，而略爲點示「高潔」與「廣大」之義；誠屬一語雙關與一字兩用。如此緊縮之筆法，不但行文有力，且述事精勁。唯於嚴子祠堂記中而將其與光武同等並述之，則似乎爲祠二人而非專祠一人矣，如此則或有脫題離旨之嫌；然文正却在結語中，更緊縮之而以十六字則緊扣主題而直述主旨矣。如：

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；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。

由此十六字對偶之工整，足見文正藝境之高明；並且又極謹慎與虛心，按「先生之風」句，原來「風」爲「德」字，竟因李觀之建議，文正則悅而從之（洪邁：容齋五筆卷五）（註二三）；且其悅從之際，仍極謹慎與虛心，以其當時「凝坐顙首，殆欲下拜」也（范公言行拾遺事錄）。蓋若有山有水而無風，則山不鳴水不流，如何能够「蒼蒼」與「泱泱」（案此皆形容詞當動詞，與動詞當形容詞）？且德爲內在者，風爲外在者，君子而欲使「貪夫廉，懦夫立」（嚴先生祠堂記語），則必須化其德而爲風，故曰：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」（論語，顏淵）。

文句愈濃縮，愈緊湊，則愈警譬，愈感人，亦顯得愈美、愈勁。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（論語，衛靈）。「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」（論語，公冶長）。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（論語，爲政）。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（論語，述而）。文正乃「依經敏學」而「游心儒術」者，其運字造詞，亦頗能以簡駁繁，如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（范集卷五，靈鳥賦）。「儒者報國，以言爲先」（范集卷四，講觀察使第一表）。「惟德是依，因心而友」（范集卷五，淡交若水賦）。「思苦口以進言，勵清心而守道」（范集卷四，謝賜鳳茶表）。「持一節以自信，歷三黜而無悔」（范集卷四，鄧州謝上表）。」「不以毀譽累其心，不以寵辱更其守」（范集卷四，鄧州謝上表）。至於其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（范集卷八，岳陽樓記）；與「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，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」（范集卷四，謝轉禮部侍郎表）等文句較長、虛字較多、且對仗重疊之語式，則正與「百姓足、君孰與不足，百姓不足、君孰與足」（論語，顏淵）與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（孟，梁惠王上）等句，同一處心與設意；蓋輾轉重複而感人尤深，故雖輾轉重複而不覺其冗繁。若云文正只工於格言式之對偶文句，雖勁有餘而美不足，以其少生動、少活潑也；此又非盡然。蓋文義不同，文體自必隨之各異，文正之文才殊不限於一隅，論其寓嚴肅於輕鬆之作品亦有之，如「當大暑時飲之，若餌白雪、咀輕冰，凜如也。當嚴冬時，若遇愛日、得陽春，溫如也」（范集卷八，清白堂記）。「或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；浮光躍金，靜影沉璧。……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皆忘；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」（范集卷八，岳陽樓記）。讀其此句時，則令人聯想到孔子雖然「發憤忘食」而「不知老之將至」（論語，述而）；但其「燕居」時，却是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」（同上）。

文正之文章，最有氣勢之美與康壯之勁者，即爲其層漸而逼進之筆法，讀之則以後浪以推前浪，在澎湧中顯其美於氣勢之內，在秩序中顯其勁於康壯之間。如：

夫善國者莫善育材，育材之方莫善勸學，勸學之要莫尚宗經；宗經則道大，道大則才大，才大則功大。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，安危之幾存乎易，得失之鑒存乎詩，是非之辨存乎春秋，天下之制存乎禮，萬物之情存乎樂。故俊哲之人，入乎六經，則能服法度之言，察安危之幾，陳得失之鑒，析是非之辨，明天下之制，盡萬物之情。使斯人之徒，輔成王道，復何求哉（范集卷九，上時相議制學書）。

案此種句式中，有其不變之介詞（如「存乎」是之），則秩序之美即井然於紙上；亦有其必變之單字（如「言、幾、鑒、辯、制、情」等是之），則澎湧之勁即躍然於文間。唐代陸贊善用此體，其動人之深者，至使「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」（舊唐書卷一三九，陸贊傳）。文正之文章，有時酷似陸贊（參見陸宣公奏議），則文學修養之高，可以想知。文正之此一文體，亦寓多種句式，有時雖然長短句相間而排列之，相疊而參差之，則看似紊亂而實爲對稱，看似偏頗而實爲平衡；其有壓倒式之美，又有載承式之勁。如：

某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，正在乎固邦本、厚民力、重名器、備戎狄、杜姦雄、明國聽也。固邦本者，在乎舉縣令、擇郡守，以救民之弊也；厚民力者，在乎復游散、去冗僭，以阜時之財也；重名器者，在乎慎選舉、敦教育，使代不乏材也；備戎狄者，在乎育將材、實邊郡，使夷不亂華也；杜姦雄者，在乎朝廷無過、生靈無怨，以絕亂之階也；明國聽者，在乎保直臣、斥佞人，以致君於有道也（范集卷九，上執政書）。

案：文中之「在乎」與「以」、「者」、「也」等虛字助詞皆未變，則見其厚重整然而全篇未變；又因其所有的單字動詞（如舉、擇、救、復、去、阜、慎、敦、育、實等）都在變，則覺其捷暢活潑而整篇全變。變中寓其不變，不變中而寓其變，此即格式與律法相兼，緩急與抑揚互用；不但便於作者說理，並且便於讀者領會。所以，此種句法最易說服人，亦最易感動人；李德裕就曾常用如此句法以曉君馭衆而造成「會昌中興」者（參見會昌一品集）。

欲求文章之美而勁者，自須多種文法與多種句式之適度調配與交互運用。文正在同一段文章之中，則以正反法啓之於先，

又以呼應法乘之於後；如此既見其曲折，亦見其曲暢。如：

臣聞：巧言者無犯而易進，直言者有犯而難立。然則直言之士，千古謂之忠；巧言之人，千古謂之佞。……況臣之所言，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行之者。……臣聞國之文章、應於風化，風化厚薄、見乎文章。……故聖人之理天下也，文弊則救之以質，質必則救之以文。……惟聖帝明王，文質相救，在乎己不在乎人（范集卷七、奏上時務書）。

此種筆法，則隨時說理，亦隨時結論；既可說其說理與結論相距極近，又可說其結論就在說理之中。且說理既分正反兩面，而結論又分深淺兩層（如「故聖人之理天下也，文弊則救之以質，質必則救之以文」爲第一層，而「惟聖帝明王，文質相救，在乎己不在乎人」爲第二層）。如此之大手筆，雖適於大文章，但文正寫短文時，亦常用此法。如：

……則知節者禮之本，禮者節之筌；節假禮而其用斯顯，禮能節而其功乃全。所以下蟠乎地，上極於天，是謂治之本也（范集卷五、大禮與天地同節賦）。

……剛而上者宜乎主，柔而下者宜乎臣。慎時行時止之際，寧迷進退；察道長道消之際，自見屈伸；此立人之道也（范集卷五、易兼三才賦）。

如此，則說明卽是結論，而結論又再作說明；此乃交互遞進，步步深入；看起來句子似在層變，而不易執着；到最後結論最爲淺顯，一目瞭然。

文正之文章，固有通篇爲駢體者（如范集卷四，遺表），在整體之組合中，與局部之點綴中，以見其安定之勁、與整齊之美。亦有通篇爲散體者（如范集卷八，近名論），在主旨之組合下，在氣勢之貫注下，以見奇特之勁、與蒼古之美。亦有以駢體與散體合成一文者，其最著名的岳陽樓記，就是此一混合體的大傑作。如：

若夫霪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；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。日星隱耀，山岳潛形；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。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。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；感極而悲者矣！
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；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。波鷗翔集，錦鱗游泳；岸芷汀蘭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長烟一空，皓月千里；浮光躍金，靜影沉璧。漁歌互答，此樂何極！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皆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！

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或異二者之爲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居廟堂之高、則憂其君，處江湖之遠、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退亦憂；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（范集卷八）。

此雖在寫景，而景中抒情；雖爲文人之筆，却寫仁者之心。其雖然「感極而悲」，但悲中却涵有真愛；其雖云「此樂何極」，但樂中却蘊有實憂。雖然眼前「氣象萬千」，但其胸中却是悲憂萬千。在此之情緒下寫景緻，自必藉景緻以抒情緒；所以其運筆所至，有時略似詩文，有時略似詞賦；蓋此等文章適於雜體也。進而言之，雖然文中時「用對語說時景」而「世以爲奇」（註一四），但不可「病其辭氣近小說家」（註二五）；蓋雖其「文體隨時」而轉，但却必以「理勝爲貴」，就此而論，「豈可與傳奇同日而語哉」（陳振孫：直齋書錄解題）！由於文中有不少「奇語」，所以可稱此文爲「奇文」（楊時；楊公筆錄）。文正畢竟能文，而成此不朽之作。

附 註

註一：文正很少爲人題字，在文集中只見爲滕子京「聊書一軸上寄」（

見東軒筆錄及文正年譜。

范文正公集卷十，與滕子京）。

註二：案青社即青州，今山東省益都縣。

註三：子曰：「伯夷叔齊，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」（論語，六十四歲）

註七：唐代試「身言書判」之情形，可參閱新唐書卷四、五選舉志，唐

會要卷六九、縣令，卷七四，選部。

。又曰：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叔齊與」（論語微子）。論

語又載子貢問曰：「伯夷叔齊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

曰：「怨乎？」曰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」（述而篇）。

所養。」

註四：首陽乃尊稱伯夷者，案周武王伐商，伯夷叔齊叩馬而諫，及勝商

，而有天下，夷齊恥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採薇而食，遂餓死。

註五：文正於靖康元年（公元一二二六）蒙欽宗追封爲魏國公，見范文

正公集，補編卷二，追封魏國公誥。

註六：文正少時曾讀書於長白山醴泉寺（今山東省鄧平縣南）。——詳

註一二：載於說郛卷第六十二（涵芬樓本）。

註一三・魏泰東軒筆錄載曰：「文正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，日作粥一器，分爲四塊，早暮取二塊，斷螯莖，入少鹽以

啗之」（參閱范公年譜，二十三歲）。

註一四・此乃文正祭韓少傅文之語（范文正公集卷十一），蓋其藉此述

懷也，故採用之。

註一五・黃蓼園詞選云：「開首四句，不過借秋色蒼茫，以隱抒其憂國

之意，『山映斜陽』之句，隱隱見世道不甚清明，而小人更爲得意之象。『芳草』喻小人，唐已多用之也」（徐珂・歷代詞

選集評、引，商務本）。

註一六・當時在詩壇較負盛名者如林逋、石曼卿、梅聖俞、蘇舜欽、歐陽修等，皆與文正爲友（見范文正公集卷六卷七）。

註一七・明代祁承樸澹生堂藏書約、讀書訓云：「（范文正公）多延賢士，胡瑗、孫復、石介、李觀之徒與之游」（知不足齋本）。

註一八・參見陳廷傑撰宋詩之派別（小說月報十七卷，載於中國文學研究，商務本）。

註一九・參閱歐陽永叔集八冊、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，及同冊、與

杜訢論祁公墓誌銘。

註二〇・何薳春渚紀聞卷七載曰：「（歐陽修）作文既畢，貼之牆壁

；坐臥觀之，改正盡善，方出之示人」（參閱陳善・捫虱新話卷五）。

註二一・范文正公集、蔡增譽序。

註二二・范文正公集、毛一鷺序。

註二三・參閱李如篪東園叢說卷下（指海影印道光本），及謝榛四溟詩話卷三（續歷代詩話本）。

註二四・陳師道後山居士詩話（卷一）論曰：「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話說時景，世以爲奇，尹師魯讀之曰！『傳奇本爾』。傳奇，

唐、裴鉶所著小說也」（百川學海本）。

註二五・王文濡古文辭類纂評註（卷五四）論曰：「范文正公岳陽樓記，歐公病其辭氣近小說家，與尹師魯所議（參見註二四），不約而同」（中華書局出版）。